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Volume 3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6-1995

談香港的學者散文 A Study of Hong Kong Essayists in the Academic Sector

Peisong F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rmlc_3

Recommended Citation

范培松 (1995)。談香港的學者散文。《現代中文文學評論》，3，13-30。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rmlc_3/3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Volume 3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談香港的學者散文

范培松

—

所謂學者散文，是一個比較富有彈性的概念，但約定俗成確有它的特定內涵和品位，乃是指學者寫的具有較高學養和品位的並對社會持有文明批評的抒情小品、文化小品、書齋小品和隨筆等文。在港台一般稱之為理性散文。其涵蓋面雖寬廣，但主體性格和面目卻非常清晰。二十年代的“語絲體”散文，抗日戰爭時期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和王了一的《龍蟲並雕齋瑣語》等藝術論文可以稱之為中國現代散文中的學者散文的傑出代表，他們任意而談，不看他人臉色，不為任何人擺佈，講私話，發私論，形成中國學者散文的誠實的傳統。

香港學者散文的發展和大陸散文的發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繫。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梁實秋從大陸到了台灣，他以《雅舍小品》為代表的學者散文大量在港台發行，就產生了很大影響。再如對香港學者散文中有所成就的有特色的作家如余光中、董橋、梁錫華等進行考察，他們的創作習慣、風格和品位深深烙上了華人的印記，應該說他們都是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學者散文的一脈香火的延續。香港學者散文當之無愧是中國現當代散文的一個重要的收穫。

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香港學者散文的興盛和發展，又同它所處的特殊環境和空間緊密相關。從宏觀上看，香港是個自由港口，國家意識、黨派意識和民族意識比較淡化，文學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對時政對社會進行近距離的文明批評，同時行政干預也較少，不必急功近利地受到政治的同化，導致學者的心態相對寬鬆。而且香港的報刊多，發表的園地多，更為學者散文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創作基地。倘若再從局部的具體的小環境看，如有影響的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散文羣所活動的空間更為特殊，香港中文大學的美麗無比的八仙嶺、吐露港時時滋養這批學者作

家，同時香港中文大學長期以宏揚中國文化的根本，招募和匯集了一批具有中西文化學養的散文家，成為香港學者散文的中堅，推動了香港學者散文的發展。所有這一切也從一個側面對我們的中國散文發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經驗。這也正是筆者為何注視和研究香港學者散文的緣由。

二

香港學者散文從作者面來考察，主要是由兩部分學者構成。一部分是以大學的教師為骨幹，其中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散文作家羣的成就最為突出，其代表人物可舉先後任職於該校的余光中、梁錫華、思果、小思、黃維樑、黃國彬、潘銘燊等為例，還有香港大學的陳耀南、梁秉鈞等。另一部分是以報人學者為主，其代表人物當推《明報》的總編輯董橋，其他成就顯著的還有《信報》的戴天等。從總體上考察，香港的學者散文亦依賴於報章。香港作為自由港，報刊林立，報章專欄、隨感錄式的時評應運而生。誠然，在六十年代以前尚未形成報紙專欄。“至六十年代後，由專人執筆的專欄才漸漸發展壯大，經七十年代不斷開拓終於蔚為大觀。”形成“裂土封疆”^①的今日局面。“一框一專欄的大局愈來愈在副刊上愈固定，每專欄就成了某作者每天筆耕的私家地。”^②

報刊專欄雖則滋潤孕育了香港的學者散文，不過，這種散兵遊勇式的個體經營的專欄，畢竟很難形成氣候。但到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著名的學者散文家余光中、梁錫華、思果先生等都先後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他們紛紛出版了散文專集，形成了以散文獨標一幟的中大學者羣。他們中既有領風騷的作家如余光中、梁錫華等，又有風格各異、同氣相求、同聲相和的同志作為羽翼，如思果、黃國彬等。更值得一提的是還有積極在為倡導散文發展，進行腳踏實地的教學、研究和示範創作的學者散文家小思和黃維樑，使得香港中文大學有一種特殊的學者散文氣候。考察香港中大的學者散文羣落的形式，有以下三點令人印象深刻：

1. 這些學者散文作家，都具有中西文化的涵養，既熟諳散文理論，又能創作（包括散文、小說、詩歌）；既有學者風度，又有作家創作的過硬本領。
2. 由於香港這個城市的身世曖昧，決定這批學者散文作家的情感特別豐厚和複雜，他們運用中文創作，思維習慣中國化，身上有着共同的中華民族的情緒，但他

們的生活形態、意識形態又和同代大陸的學者散文作家不同，其取材、立意乃至表達的方法非常個人化、情趣化。

3. 香港中大學者散文羣並不是特指某幾個人，而是作為羣落的一種象徵和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黃維樑先生編撰的中大學者散文選《吐露港春秋》，共輯錄了二十位中大學者的散文，這是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散文羣的正確的理解和評價。因此，這個學者散文羣色彩繽紛，風格紛陳。

相比之下，報人學者散文更要個體化一些，散漫化一些。雖則報人學者寫散文的較多，真正引人注目的卻較少，但《明報》總編輯董橋卻是首屈一指，一花獨放，顯得非常燦爛和耀眼。

三

鳥瞰香港學者散文的核心問題，必須正確評價他們的功利觀。

翻開本世紀的散文史，可以清晰看到，功利觀一直在折磨着散文家。功利觀的內涵是多重的：即在對待社會對待黨派對待政治對待人生等問題上顯示的目的和傾向。整個中國現代散文史的發展時時圍繞求功利和反功利而展開。當中國現代散文還在搖籃裏，它就大喊大叫，顯示出它的功利性。梁啟超大力鼓吹“文界革命”，積極創建他的野狐式的散文“新民體”，也是為他們變“法”服務。在他看來，“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③他想用“新民體”來載“法”傳“法”。在五四運動中，當時倡導白話文的先驅者，都氣勢洶洶大批特批“文以載道”，但他們推出的現代散文的第一批胎兒“隨感錄”，都有一種佈道的莊嚴。雖則從二十年代開始，“小品之王”周作人想用他的沖淡散文，淡化散文的功利，遠離社會，疏遠政治，種他的“自己的園地”，而他事實上卻非常懂政治、非常瞭解社會，他是無可奈何地在亂世中以此來保存自己。懂政治卻不能談政治，關心社會卻又不得不遠離社會，這種情感錯位釀造了他的散文的獨特的“澀”。之後，由於內亂和外患，大多數散文家都自覺地緊跟社會步伐，散文載道成了風尚。只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和戰爭炮火有些不大協調；應該說，它為中國學者散文開創了“反功利”之風氣。到後來戰火平息，中國大陸上，散文依然被功利糾纏着，圖解政治概念，公式化模式化泛濫，直到“文革”時發展到了頂峯。正因為如此，大陸的讀者閱讀和研

究香港學者散文，對香港學者散文何以如此專心致志地對身邊的某件事津津樂道地就事論事而不理解。因此有必要對香港學者散文遠功利、不重傾向的創作態度作一剖析。香港學者散文遠功利、不重傾向的創作態度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對黨派對政治厭惡和畏懼：

由於香港的特定的自由之港的地位以及殖民地的性質，決定了他們以一種超然的姿態對待黨派對政治。在他們看來，“政治免不了權謀欺詐，翻雲覆雨”。“近代的老百姓吃的是政黨的苦”。^④這種籠統的不加分析地對政黨和政治的排斥，反映了香港學者對黨派對政治缺乏瞭解和畏懼的心理，因此即使是功利最強的雜文，到了香港散文家手中，也都是“寫個人生活的，……宛如寫日記那種講衣、食、住、行以至自己家庭、兒女的文字，……至於介紹娛樂界人物以及介紹飲食遊宴的雜文，也是蔚為風尚的。”^⑤

2. 對社會熱點的忽視和冷漠：

香港學者對政治和黨派的畏懼，使得他們的散文不願涉足社會，尤其是以抒情見長的散文，對社會熱點的忽視和冷漠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人生大事和社會問題，他們也常常會把它“自我”化。學者劉創楚的散文〈問題人生〉典型地反映了這一點。在他看來，人生的問題可分“小”、“中”、“大”：“小”是指吃飯穿衣之類，“中”是指晉級加薪之類，“大”是指兒女太太的事業。^⑥

誠然，以上的概括僅是指出香港學者散文的一種傾向性現象，各個學者因人而異，情況都不相同。有些學者其實非常懂得政治、瞭解社會，他們對政治、對社會不發言則已，一發言常常一鳴驚人，如梁錫華，尤其是他也清醒地意識到上述傾向的存在，並對這種傾向持保留態度，為此，他想從文化觀點着眼，對上述傾向予以改正，提出：“雜文應該很有發展的潛質。我們不一定要使它成為所謂投槍與匕首，但應該使它成為一點照亮幽暗的光明”。^⑦董橋在《雙城雜筆》中也指出，“既然是文學，既然要寫給人家看，總得有點責任感才說得過去，才交代得過去。”^⑧這些識見委實可貴，應該受到大家的重視。

香港學者散文遠功利、不重傾向的風尚形成，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受海峽兩岸政治衝擊波的夾擊和輻射，使得這些遠功利、不重傾向的中性散文在自由之港擁有它的最忠實的讀者；二是香港學者身上都有一種傳統的“土”和西方的“紳士”混合的氣質，這種混合使得他們對“自我”有一種莫名的自信和優越感。因此在散文中唯我

至上，並能保持一種寫“自我”的樂此不疲的韌的精神；三是梁實秋用《雅舍小品》避世態度能在亂世中生存下來的成功，也是對香港學者散文遠功利、不重傾向的一種實在的精神鼓勵。

香港學者散文遠功利、不重傾向，從創作來說，重視個人體驗情趣的抒寫，大部分作品均富有真情實感，也為我們從眾多的側面瞭解香港提供了可靠的反光鏡。但由於對社會對政治採取迴避的態度，因此識見雖豐富卻不堅挺，且學究味較濃。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魅力。

四

香港學者散文羣中有成就的頗多，現選擇不同風格特點的數名學者評述如下：

余光中

余光中的散文才高氣宏。

上帝對余氏特別偏愛，賜予他那麼多的智慧那麼多的靈氣。生活中一件平凡而又平凡的事，到了他的筆下，就會變得生動活躍起來，好比一杯清水，在他的才氣發酵下，竟會魔術般地釀成一瓶美酒。比如坐火車過山洞，大概一般人都經歷過的，應該說沒有什麼稀罕，可是到了余氏筆下，竟變得這樣不同凡響：

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洞。驚魂未定，兩壁的迴聲轟動不絕，你已經愈陷愈深，衝進山嶽的盲腸裏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黑洞把你吐回給白晝。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①

從火車進山洞到出山洞，乃是瞬間的事，但余光中卻牢牢地逮住它，憑自己的藝術感覺，通過“撞來……罩下……愈陷愈深……迎你……豁然開朗……吐回”等一連串詞語加以從容地切割，準確地把坐車人對突然來到的黑暗，又驀地回到光明的

驟起驟落的心態情緒變化，極有層次地節奏地刻畫出來。這種變化可以說是以秒來計算，其準確程度也無懈可擊。他不愧為散文高手。

於是，我要奉勸欣賞余光中散文的讀者，要有一個思想準備：你若抱着常規心理，要想按部就班地到余氏散文中尋找一個思想或一個目的，你一定要失望。你必須對余氏的才氣有足夠的估價，要準備為他的才情所裹挾，被他拖着去馳騁，甚至有時要被他的才情的浪潮所淹沒，喝幾口水。若有了這樣的準備，你才能從容地從他的散文中獲得真正的享受。

余光中是以詩起家的，散文創作也極富，堪稱詩文並茂，用他自己的話說，“散文與詩，是我的雙目”，“雙目合，視乃得”。^⑩他的散文集有《逍遙遊》、《聽聽那冷雨》、《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憑一張地圖》、《隔水呼渡》等多本。

余氏散文“氣”很盛。孟子一生鼓吹散文創作要有“氣”，他標榜自己的散文有“浩然之氣”。他雖則沒有對“浩然之氣”進行具體界說，但我對孟子的觀點非常贊同。氣者，不可捉摸但可實實在在感覺。讀余文，我最深刻地感受到其氣之旺盛，不管寫什麼題材，皆是洋洋灑灑，勢不可當。尤其是他的遊記，他能借他的“氣”的威力，把他所見所聞所知所感，一股腦兒傾瀉出來，汪洋恣肆，很不克制，上帝賦給他太多的才氣，他又為才氣所累，惜乎哉！

和他的遊記相比，他寫人敘事的家庭小品、社會小品似更為人們喜愛。如他的〈我的四個假想敵〉，膾炙人口，為人們所喜愛。這類小品，余光中寫得無拘無束，瀟灑自如。在〈我的四個假想敵〉中，作者以二女錄取台大外文系起筆，一開始就把四個女兒長大，將要嫁人，自己擔心失去女兒，處在“腹背受敵”^⑪的困境擺了出來。這實在是一件家常事，卻也是一個牽動眾人的社會問題。緊接着，他就讓感情如野馬一樣奔馳，唸起一本兒女經來：其中有女兒成人前的可愛，有不能用“急凍術”把她們久藏的遺憾，有被四個假想敵騷擾和對他們防不勝防的苦惱，有父親的權威被動搖的嘆息等等，全文錯綜複雜，憂樂交叉，卻又趣味盎然，情深意濃。全文沒有一個恆定的目的，作者只是把他平時和女兒生活在一起的感情結晶，如天女撒花般地撒到讀者面前，但由於全文有一根固定的軸心——父女情深，牢牢支撐着，所以這篇散文成了一株繁花盛開如火塔般的木棉，光彩奪目。尤其是在這篇散文中，余對父女的軸心的家庭的禮讚，可稱得上是典型的中國學者的傳統家庭觀念的情緒，這正是世界華文文學中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民族特色。

爲了更清楚地認識余氏散文，我還想把他的散文和香港學者散文中另一高手梁錫華作一比較。余梁皆才氣橫溢，皆學貫中西，皆感覺敏銳，但風格卻異：余氏只管悶着頭，關起門，獨個兒把感情傾瀉，彷彿只管掃自己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儘管有時也偶爾帶一兩筆，對人生發一點感嘆，如〈牛蛙記〉中寫自己深受窗前牛蛙鳴叫的煩惱，採取各種手段，都不能消滅之，嘆曰：“真像他媽的越共！”^⑫這些句子，顯得有點心不在焉，不甚有力。但梁氏卻時時要睜一隻眼，喜歡在寫人狀物描景中，騰出筆墨來，鍼砭人生，而且非常用心。如在〈漫語慢蝸牛〉中那些精彩的牛論——人不如牛，令人猛省。又如梁氏抒寫在加拿大求學求職的艱辛，處處激起人們的共鳴。相比之下，余氏的心靈大門關閉得緊一些，因而，文章的書卷味也就更爲濃烈一些。

梁錫華

對梁錫華的散文，可以用得上李白的話——“相看兩不厭”。

就其人而言，梁氏頗怪。他不是一個嚴密的系統的思想家，儘管他很有思想；他也不是一個成熟的叱咤風雲的政治家，儘管他很懂政治。他是一個怪儒。唯其如此，他成了散文家。他把個人的思想、見解、常識統統自由自在地熔鑄到自由的散文中。雖則他什麼都寫，寫什麼都好，曾被著名學者夏志清教授譽爲“真正的學者，也是當代少見的嶺南才子”，^⑬但在我看來，他寫得最好的是散文。他是港台“散文界最燦爛的一顆星”。^⑭

梁錫華在散文創作上，有許多特有的優勢：一是學識淵博。他學貫中西，既對國學有很深研究，曾在一代宗師陳寅恪身邊當過助手，對辭賦有很深研究；又長期受西方文化薰陶，先後在加拿大、英國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並擔任教學工作。因此能夠吸收中西散文的精華，並運用到他的散文創作中。二是他周遊列國，見多識廣。人世間周遊列國者甚多，未必都能成爲散文家，但對於一個才情出衆的作家來說，周遊列國對他肯定是錦上添花。三是耳聰目明，關心世事。他不願把書房門關閉，而是時刻把自己置身於山野或世界漩渦之中，吸天地與人間的靈氣，滋補自己。因此他的散文沒有霉氣、暮氣。

梁錫華的散文創作很豐富。大致分一分，他的散文有這樣三類：一類是遊記小

品，如《八仙之戀》中的乙輯“遊踪與感想”的十篇，《我為山狂》中的一些篇章；第二類是雜文，包括雜感、閒話、隨筆，這些均是他的以人生衆相、社會世態為話題的小品，可稱之為社會小品，是梁氏散文中最應該值得人們重視的作品，受人們歡迎的如《漫語慢蝸牛》，“三思篇”中的系列小品，均屬這一類；第三類是文史小品，對文壇上的種種現象及各類學術問題，進行無情指點，如《祭壇佳里》、《四八集》、《己見集》中的一些篇章。由於篇幅有限，本文想重點對梁氏的社會小品作一評點。

梁氏的社會小品皆入“品”，而且品位較高。社會小品的“品”在筆者看來，第一注重“識”，第二需有“文”，“識”“文”俱備，即為上品。對此，梁氏有深切體驗，他說：“有所感的抒情，幾乎任何人在生命春花的日子多少都經歷過，然而有所悟之情而能抒能寫的，實屬寥寥”。^⑨應該說，梁氏正是這“寥寥”之中首屈一指的。

梁氏為他的社會小品採集材料，面廣路寬。大至南極的環境——可稱得上是宇宙之大，小至蝸牛——蒼蠅之微，只要他有興趣，都會被他採擷到小品中來，經他一番收檢，曝出一點你所意想不到的見識來。我驚異他的精力他的敏感他的悟性。人們在南極挖洞勘探，他要管一管（〈三思篇·饒了它吧〉）；提倡保護動物的那些人的過火作為，他又要管（〈三思篇·是解放嗎？〉）；對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他更是拍案而起，簡直是非管不可（〈四八集·東洋鬼胎〉）。他精力無窮，對什麼都感興趣，對什麼都要思索一番，這正顯示了他的勃勃生機和生命力的旺盛。

什麼都管，對什麼都想說一通，這要冒一點風險：一是可能“淺”；二是可能“糊”。但梁氏的學識、閱歷，以及他的高超的文字功夫，使他的社會小品不管寫什麼事，總要顯示出一些令你非聽不可，聽了又非深思不可的一些識見來——但又決不用什麼赫然的語言赫然的情感來虛張聲勢。讀他的社會小品，讀者決不會失望——同意他觀點的不失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也會低下頭來深思一番，感到他能提出這個問題就了不起。因此，不管什麼讀者，都會從他的社會小品中獲得一種滿足。

他的思維流程很有一點紳士風度。常常是如飯後散步那樣從容走筆，抓住一件事，款款起步，漫無目的，漫不經心地散起步來。如《漫語慢蝸牛》是以某夜在道旁發現一頭五寸大的蝸牛起步，接着就不緊不慢地耐着性子觀察起蝸牛的飲食起居來，極寫蝸牛相處之“和”。此時，他自己彷彿就是一隻蝸牛。妙的是他一手寫蝸牛，另一隻手卻還要寫人，時時牛與人對照，搞不清他的目的是寫牛，還是寫人？

當他寫到蝸牛在前進道路上遇挫時，文中寫道：

牠們在前進的道上，即使遇阻遇挫，還是一分分、一寸寸地力爬。此路不通則彼，彼路不通則此，那裏像我們人類中的一類，失敗了就罵，就哭，就賭氣，就怨天，就尤人，就尋死！人不如牛，我們難道還有甚麼可辯的？^⑩

好一番“牛論”，原來是要說“人論”，結論是驚心動魄的——人不如牛。最後的感嘆是至誠的，雖則有些迂腐——他認為“世人只要略效蝸牛”，就可萬事大吉了。沒有那麼容易，但他的那顆至誠的心，卻是應該讓我們對他脫帽致敬的。

還值得指出的，是梁氏散文的辭賦習氣很重，喜鋪陳，喜張揚，喜用連珠的句式強化感情，有一種勢不可當的氣概。如：

或夜、或晝、或昏、或晨，特別在暑日，八仙的周圍和前後，會無視時間和空間而躍起萬馬千軍。那飛、疾、寒、亮、尖、長、蛇突、龜縮、吐銀、擲白的一閃、再閃、多閃的電光像神靈的啟示貫通幽明，照響轟轟洪雷，聚攏千秋上下的積忿，而無聲有恨齊呼應的，是多少皺龐眉、鼓怨腮的沸騰墨雲堆！

〈八仙之戀〉^⑪

這裏，你摸一摸夏天，溫中帶涼；冬天，硬梆梆的冰雪冷。這裏沒有崇山峻嶺；這裏沒有湖泊海洋；這裏沒有高樓大廈；這裏沒有直挺挺的超級公路；這裏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匈牙利種種〉^⑫

讀這樣的語句，如同滑冰，滑溜溜的，過癮。誠然，梁氏聰明，倘若全文都是如此，讀者是忍受不了這種感情強度的，他只是在總體上的漫不經心的散步中，穿插一點這種快跑衝刺，目的是以這種強音符來形成一種節奏的參差，激起感情的浪花。從而使行文不至於平板和單調。

董 橋

從文體上看，董橋的散文有些特別。他學養豐富，博覽羣書，許多散文是論人說文，有時幾乎是在掉書袋，但它並不是純書齋小品，因為在論人說文時，不時要騰出一隻手來，對人生世態作一番評點，在字裏行間中閃耀着智慧的光芒。再者，他“半輩子在幾個傳播機構出版單位做事”，^⑩尤其擔任《明報》總編久遠，對時事有一種職業的敏感，許多散文均是鍼砭時弊，但它又不是純政治評論或社會雜文。他的散文，行文瀟灑，妙語連篇，情文並茂，趣味盎然，要準確地概括，用二十年代初周作人提出的“美文”來稱呼它是最恰當不過了。

董橋散文有倔強的個性，他對自己的觀念、智慧、見解充滿自信。他對此有一個自我評價，這是職業鍛煉的結果，“一個從事編輯工作和過着寫讀生涯的人一旦沒有理想、喪失信心，根本不可能提起勇氣坐到桌前迎接新的一天。”^⑪這種勇氣所形成的信心之一，是思路寬闊，取材廣闊，人間世事，政治也罷，經濟也罷，文化也罷，他都要議一議，論一論，這一雜取使得他的散文成了百科全書。信心之二，是敢於獨樹一幟，觀點不驚人誓不休，從不重複他人的話，更不去炒他人吃剩的冷飯，總是想盡辦法顯示出一些驚人的見解，以慰讀者。別的不說，就以他論文為例，他對大陸上為人們推崇到天上的冰心、錢鍾書，議起來就毫不留情。大概吾輩讀慣了那些東抄西貼的拾人牙慧的文字，因此讀到董橋的散文，感到過癮、解渴。信心之三，新而奇，但又不怪不僻不澀。他能機智而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新奇觀點，如論書法：

臺靜農的字是臺靜農，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許多地方固執得可愛，卻永遠去不掉那幾分寂寞的神態。這樣的人和事，確是很深情的，不隨隨便便出去開書屋是對的。他的字裏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滿滿掛在展覽廳裏畢竟有點唐突。臺先生一定會說：“似可不必。”

〈字緣〉^⑫

論人生：

中年是雜念越想越長、文章越寫越短的年齡。

〈中年是下午茶〉²²

論學問：

有專業而無學問，比如有圍城而無城門，進出兩難，也看不到城外是火還是水，圍城裏的安危禍福就更費思量了。

〈如觀火觀水也〉²³

這些觀點，你可以不必贊同，但你不得不欽佩。這是董橋式的語言、董橋式的觀點，機智過人又一片坦誠，令你耳目一新。說到底，這種自信正是董橋的人格的物化和顯現，它既有信念又有學養的支撐，可以稱得上文明批評的一種模範。散文是一種見人見心的主觀性很强的文體，雖如此，很多寫散文的總喜歡把“我”把“心”掩蓋起來，扭扭捏捏，令人生厭。但董橋的散文就是董橋的人——一個赤裸裸的自我。

董橋是個文體家，他對散文的體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他用武俠小說來寫散文，〈薰香記〉就是一例，借老人、碧眼海魔和老人的女兒來表現中英談判香港的前途，不管它是否成功，也可稱得上是一種出格的嘗試。使得他的散文成爲一種似政治似學術似論說似小品的邊緣性批評模式。同時，他對散文有許多見解，如：“散文須學、須識、須情，合之乃得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所謂‘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²⁴這是很富有建設性的，應該引起我們重視。

思 果

在香港學者散文羣中，思果的學者散文成就非常令人注目。

思果，原名蔡濯堂，江蘇鎮江人，1918年生。他認爲，“散文家多數是有點學問的，即使不是最偉大的學者，也是涉獵很廣的人。”²⁵他正是以此求己的。他學

貫中西，是著名的翻譯家，有深厚的西方文化的根基，曾譯過《大衛·考勃菲爾》等二十餘種作品。在散文創作上也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著有《私念》、《藝術家肖像》、《林居筆話》、《香港之秋》等十餘本作品。其中《林居筆話》和《香港之秋》是他的學者散文代表作。

思果的學者散文嚴格地信奉他的“近乎人情”、“言之成理”的信條，^⑥激發他創作欲望的皆是身邊的家常事、煩心事，如寫信、妻兒、購物、抽煙、露足等。這些事都在他的腦海裏、心窩裏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或許，在一般人看來，可以忽略不計，但他卻牽腸掛肚，要想吐一吐，發洩一番。因此，他頗有耐心地用放大鏡來把這些家常事、煩心事看了又看，把自己的真誠融進去，從而有頭有尾地向讀者講出一番人情味濃濃的話語來。典型的如《林居筆話》中的〈神經病〉。思果耐心地向讀者展示了現實生活中一系列的“輕微的偏執狂，不合理的疑懼，過分自是”等等的“神經病”症狀，並中肯地分析了這些病的來龍去脈，最後“曝”出了這樣一番話語：

人的心——精神——是奇妙無比的。以為怎樣，跟事實怎樣，同樣真實，有憑有據。有人慢慢悟出道理，有人把愚妄偏執帶到地下。誰是大智，能把我們教育得完全合乎理性？也許我們如果常常記住我那位讀書不多，豪俠氣重朋友的那句話，“大家都有神經病”，就會對別人多點同情，對自己多點檢討，比倚賴理性還有用。但願這種病不要太重，有重病的不要操生殺的大權，就是人類的幸福了。希特勒恨猶太人的病太重了。^⑦

這是一種與人為善的勸人為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完全是把自我糝進去的將心比心，即真切又中肯，近乎情合乎理，令人心悅誠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思果始終認為，散文的最高審美理想應是：

寫散文是和讀者談天，因此不能對讀者演講、教訓，尤其不能大聲疾呼。更不能叫口號，因為口號不能不停地叫下去。當然不能一味唱高調。寫散文不是歌詠；讀者要聽歌，會去念詩，去聽詩人唱歌。既然是談，就要坐下來慢慢地談；所以散文不能太短，總要——道來，有頭有尾。散文裏可以有警句，但是散文不是靠警句才值得讀的。沒有警句也可以有好散文，警句太多，反而是

毛病。⑳

這樣的審美理想，使得思果的散文和讀者泯滅了距離。應該說，在香港學者散文羣中，思果的散文是最和讀者打成一片的。尤其是看慣了大陸上靠赫然的標語口號來壯聲勢的八股散文的人們，讀思果的散文會感到分外親切。

思果的散文代表之作，皆是進入老年之後所作，雖則有些篇章有一點老年人特有的嘮叨和嘟囔，但從整體上看，卻是老而有境，沒有一般老年人的癡呆和老而氣短的缺憾。這種老而有境，他是憑藉三個方面來完成的。一是引經據典，古今中外，縱橫捭闔，揮灑自如，形成一種暢達的氣勢，這是他的學養所賦予他的特有的優勢。如《香港之秋》中的〈獸性與文明〉、〈明星羣像〉、〈人相食〉等，又如《林居筆話》中的〈命運〉、〈人言〉等等。二是以純情，甚至近乎是一種童貞情緒融化他筆下的人和事。他的散文是一種“老頑童”式的噴發，在感情上比梁實秋的《雅舍小品》要純化得多。在這方面，可與小思散文並肩媲美。三是以勃勃生機的奮發力，作為文質的內核，使他的散文成為老樹上的新芽，有一種旺盛的生機。如〈五十肩〉就是這樣的佳作。文章歷數人過五十，每況愈下，身上機體中萬病叢生的衰敗景象。這本是一篇天生的消極文章，但勃勃的生機使得思果在歷數這些老化衰敗景象後，來他一個逆轉兜底翻，翻出這樣一段“又一村”的文字來：

老年衰殘，未必人就無用。許多偉大的成就在老年完成。少年人身強力壯，分心的事多，不知浪費多少精神氣力，甚至於摧殘自己。

真正的美在德性、風度，不在形體。老就老吧，我們沒有力量控制自己的外表，但是德性和風度是可以修煉的。㉑

勃勃的奮發力，勾畫出一個高品位的境界，這也就是思果的學者散文的真正魅力所在。

黃維樑

黃維樑視他的散文作品為“副產品”：“我寫長篇論文，研究文學上的某些問

題，析論某位作家的創作，這些是我的主要產品；我寫長則數千言短則數百字的散文，以敘事抒情為主，這些是我的副產品。”^⑩爲此，他在態度上對自己的散文創作和學術研究進行了比較，有這樣不同：

撰作“主要產品”如攀登險峻的高山，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有齊全的裝配，有克服萬難的精神，當然攀山者更必須是個訓練有素的爬山專家。揮寫“副產品”時，……功夫是輕省多了。……有如在坦途上行走，甚至有如走在青草地上，且有鳥語花香，是一種享受。^⑪

歸納起來，就是平和輕鬆。它是香港大部分學者寫散文時的一種典型心緒。欣賞香港學者散文對這種心緒要有一個正確認識，它是一種紳士風度的反應，它能夠有效而客觀地對人生、對社會進行近距離的文明批評，雖則在取材和表現上相當個人化、情緒化，但它能充分而坦率地發表真誠之見，使讀者感受到一種家常的溫馨，味偏甜。誠然，它也有一種目的不強的消遣性和在干預生活上的疲軟性，這和大陸學者寫散文的心緒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相對地說，大陸學者創作散文時，心態失衡，情緒傾斜，重視社會效應，味偏辣。

黃維樑的散文取材雜而博，大致有這樣三類：一類是寫人敘事的生活小品，二類是寫意識和文化反思的反思小品，三類是記遊蹤小品。不管哪一類，都顯示了黃氏的平實柔和的風格，有一種忠厚長者的風範。

且不說他那些以一些富有溫情脈脈的人情世故爲題材的小品，就是一些尖銳嚴酷的社會問題，到了他的筆下，也會在他的柔和的思維機器的轉動下，彈奏出平和的格調。如對大陸“文革”的“焚書”的鍼砭：

大陸文革時期，不知有多少書生變成牛鬼，多少書籍變成毒草。那是個書少的時代。據說文革時挨批不算嚴重的讀書人，往往能設法讀點書。書少，乃能重覆閱讀研究，浩劫之後，通一經或一子，成了專家，這樣比一向蜻蜓點水式泛讀略讀的人，收穫更大。禍兮福所倚，信焉！

〈享福的人受苦了〉^⑫

雖則這裏不是以批“文革”為首要目的，但從“禍”中帶出一點“福”來，也使我們這輩經歷文革磨難的知識分子，從中可以品出這點“福”的酸楚苦味來。其餘像尖銳批評談文論藝沒有標準的〈百年世事不勝喜（悲）？〉，描寫離鄉背井，與家人不團圓的菲傭的愁苦的〈莎蓮要回鄉〉等等，都是以平穩的語氣談論辛酸激烈的話題。這種平實柔和的風格，使得黃氏散文既厚重又誠實可信。理所當然的不足就是平板。和梁錫華的散文相比，它缺乏一種機智幽默的諧趣。

香港學者散文羣中，黃氏在研究和推進香港散文創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編選的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寫的散文集《吐露港春秋》，為檢閱和宏揚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散文創作經驗作出了貢獻。他的散文觀念活躍生動，對學者散文的論述，對流行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質疑都值得我們重視。

潘銘榮

與余光中、梁錫華等相比，潘銘榮的散文創作並不算豐富。但他的《人生邊上補白》卻深得學者散文之道，可稱為學者散文的楷模。

潘銘榮，廣東中山人，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73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現執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他學識淵博，精於目錄、版本、修辭學，並致力於《紅樓夢》研究。豐厚的學養滋潤了他的散文。香港《星島日報·星辰》著名的“三思篇”專欄，就是他和梁錫華、黃維樑共同執掌，被人戲稱為香港散文“三劍客”。

潘氏力作《人生邊上補白》公開宣告師承錢鍾書，開卷赫然寫着：“獻給我所景仰的錢鍾書先生”。其取材、其內涵、其運筆皆和錢氏的《寫在人生邊上》一脈相承。從創作角度考察，這樣的師承未必是好事，但由於潘氏的學養及智慧使得他在師承中富有創造，形成和錢氏不同的風格：錢氏血氣方剛，自稱是“痛快的一偏之見”；^③潘氏方正老成，文字中顯露着深思的成熟。

《人生邊上補白》顯示了潘氏的二難境地：他一方面極力推崇“寧靜”，認為“越能認識並享受寧靜，精神越能得到澡雪，情操越能得到提升。”^④但內心深處，卻又躁動沉悶，感到“生本不樂”。全書三十三篇，竟有十六篇談笑論幽默，幾乎佔文集一半。雖則潘氏沒有實指不樂在何處，但他在〈智者樂不如愚者樂〉裏卻露出了一

點端倪。在他看來，“人越聰明，越會反躬自問‘人生所爲何事’。問得越多，越會發覺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人怎會活得快樂呢？”^⑤因此，“如果一個人還有點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懷抱，對家國事、天下事稍爲有點思考，那麼他必不免愁歎悲戚”，感到“人生的確苦多樂少”。^⑥談笑，是人間少笑；講幽默，是世間匱乏幽默；論快樂，是天地之中太缺樂。一言以蔽之，《人生邊上補白》是一本智者求樂之作。處處可見作者皺眉狀。樂在何方？樂委實難求，治療潘氏的兩難矛盾心理實在沒有靈丹妙藥。正是這種兩難矛盾心理的磨擦碰撞，才迫使潘氏皺眉思考，在寧靜中滋生出許多感觸來，於是促使他補白再補白。可以想見，這種兩難心理不根治，還會有“二補白”“三補白”。《人生邊上補白》典型地反映了香港學者的壓抑心理。這種壓抑心理實乃是一種現代文明中的心理綜合症。它既不是由於物質貧困所造成，也不是因爲政治機器的擠壓而產生，它是在“士”或“紳士”的不爲他人所理解的內心深層的孤獨苦惱上滋生的痙攣。這種痙攣是不可救藥的，因爲這是作者“還有點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懷抱”的自學所孕育出來的清醒。正由於它的不可救藥，因此才有它的生命力，才可能在“士”或“紳士”圈裏懷着同樣的壓抑心理的同志那裏獲得忠實的知音。

《人生邊上補白》和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一樣，精於運用比較學。如：

凭窗的愛情是高蹈的，倚門的愛情是乞求的；凭窗所以暗示，倚門則是明言；凭窗是寄意，倚門是賣俏（或賣笑）。^⑦

不會笑的年青人是老人精，只會笑的老年人是老天真。^⑧

快樂時固然開懷，不快樂時也要懷開。經常地興致勃勃，快樂就會成爲戒不掉的習慣。^⑨

這種兩兩比較，可用少數的話語，把話題的內核乾淨利落地剝露。再加上這些比較來自生活，貼近生活，從生活中蒸餾出來，讀者看了，感到格外親切。這樣雖則文集中對每一話題大多起筆驟、收筆驟，但由於成功地運用比較，避免了粗疏的缺陷，使它成爲一本精緻的獨語集。

註釋：

- ① 姜山：〈對八十年代香港報紙專欄的評價〉，《香港文學》，1990年8月號，頁45。
- ② 梁錫華：〈香港報章雜文的發展〉，《祭壇佳里》，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6月，頁47。
- ③ 梁啟超：〈新民叢書·介紹新書〉。〔編按：原註不詳〕
- ④ 黃維樑：〈突然，一朵蓮花〉，香港：山邊社，1983年7月，頁15。
- ⑤ 同②，頁48。
- ⑥ 劉創楚：〈問題人生〉，見黃維樑編：《吐露港春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38。
- ⑦ 同②，頁52。
- ⑧ 董橋：〈沒有東西〉，《雙城雜筆（這個那個集）》，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12月，頁141。
- ⑨ 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台北：洪範書店，1990年2月，頁130。
- ⑩ 余光中：〈自序〉，同上書，序頁7。
- ⑪ 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同上書，頁41。
- ⑫ 余光中：〈牛蛙記〉，同上書，頁19。
- ⑬ 見梁錫華：《獨立蒼茫》（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年3月），頁7。
- ⑭ 思果：〈近代散文的開拓——論黃國彬、梁錫華的散文〉，《聯合文學》（台北），5卷9期（1989年7月），頁69。
- ⑮ 梁錫華：〈抒情〉，《四八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5月，頁31。
- ⑯ 梁錫華：〈漫語慢蝸牛〉，《明月與君同》，台北：九歌出版社，1983年4月，頁156—157。
- ⑰ 梁錫華：〈八仙之戀（代序）——我見青山多嫵媚〉，《八仙之戀》，香港：華漢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頁5。
- ⑱ 梁錫華：〈匈牙利種種——匈牙利紀行之四〉，同上書，頁111。
- ⑲ 董橋：〈新的燈影〉，《跟中國的夢賽跑》，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年1月，頁8。
- ⑳ 同上。
- ㉑ 董橋：〈字緣〉。〔編按：原註不詳〕
- ㉒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跟中國的夢賽跑》，頁240。
- ㉓ 董橋：〈如觀火觀水也〉，同上書，頁53。
- ㉔ 董橋：〈自序〉，《這一代的事》，台北：圓神出版社，1986年1月，無頁碼。
- ㉕ 思果：〈散文的欣賞〉，《香港之秋》，台北：大地出版社，1992年4月，第4版，頁207。
- ㉖ 同上，頁209。
- ㉗ 思果：〈神經病〉，《林居筆話》，台北：大地出版社，1979年7月，頁40。

- ⑳ 同㉕，頁212。
- ㉑ 思果：〈五十肩〉，《沙田隨想》，台北：洪範書店，1982年1月，頁24。
- ㉒ 黃維樑：〈自序〉，《我的副產品》，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年8月，序頁4（原書序無頁碼）。
- ㉓ 同上，序頁4-5。
- ㉔ 黃維樑：〈享福的人受苦了——書齋·書災·書債〉，同上書，頁152。
- ㉕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
- ㉖ 潘銘榮：〈寧靜致偏見〉，《人生邊上補白》，溫哥華：楓橋出版社，1992年7月，頁83。
- ㉗ 潘銘榮：〈智者樂不如愚者樂〉，同上書，頁24。
- ㉘ 潘銘榮：〈塵世難逢開口笑〉，同上書，頁38。
- ㉙ 潘銘榮：〈窗和愛情〉，同上書，頁15。
- ㉚ 潘銘榮：〈談笑瘋生〉，同上書，頁41。
- ㉛ 潘銘榮：〈快樂十訣〉，同上書，頁29。

作者任職於蘇州大學中文系。